

資訊管理與政策效果評估： 以老人研究為例

何華欽

壹、前言

臺灣的人口老化現象轉趨快速，根據經建會的統計，國內 65 歲以上的高齡家戶已逼近一百萬戶，且高齡戶主要集中在最低所得組，顯示高齡戶所得相對偏低與弱勢處境。老人家戶的增加與老人低所得家戶的擴張，顯示人口老化與老人貧窮問題日趨嚴重。為因應人口老化與貧窮對經濟安全的衝擊，政府針對老人家戶提供一系列的經濟補助安全措施，對中低收入老人、老年農民等經濟弱勢者，提供生活扶助的協助，也針對符合資格條件的老人，發放敬老福利生活津貼，以期能改善老人的經濟生活。

人口老化與老人貧窮的問題一直是學界所關切的議題，過去的研究發現老人家戶最容易落入貧窮。由於老人退出勞力市場、缺少謀生能力與經濟支持，老人家戶的貧窮率常是偏高的。老人貧窮的問題是國內社會救助關切的對象，而且不只是在社會救助方面，老人年金、老農津貼所代表的更是一種對於老人問題的重視。政府對老人提供社會救助與津貼的措施，然而

成效如何卻少有政策評估研究。本文將試圖討論老人研究資訊管理的問題，並進而提出政策評估的可行建議。

貳、人口老化與貧窮研究

經建會近期發表一份報告顯示（註 1），推估未來 20 年，臺灣 65 歲以上人口數占總人口比率將呈現倍增現象，由民國 92 年的 9.4% 上升至 113 年的 18.8%，人口快速老化已是臺灣社會必然的趨勢。

臺灣社會不僅人口老化快速，高齡老人的經濟安全保障也成為重要課題。經建會報告中，引用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臺灣地區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資料，指出兩個重要的訊息，其一是高齡老人家戶在最低所得組明顯擴增，其二是高齡老人家戶平均所得低於全體家戶。民國 85 至 92 年間，我國 65 歲以上高齡家戶數明顯擴增，高齡家戶由 85 年的 60.5 萬戶大幅增至 92 年的 98 萬戶，增幅達 37.5 萬戶，且平均每戶人數為 2 人，顯示獨居或與配偶同住的老人有增加趨勢。若我們將家戶可支配所得按戶數五等分位組來觀察，民國

85 至 92 年間，最低所得組中高齡戶數由 41.2 萬戶大幅增至 60.6 萬戶。高齡戶增加主要集中在最低所得組，其平均可支配所得僅約全體家庭的一半，明顯低於全體家庭，顯示高齡戶所得相對偏低，經濟匱乏。高齡戶的增加顯示人口老化問題的嚴重性，而高齡戶所得偏低亦增加落入貧窮的風險。

Rowntree(1901)於英國約克市(York)所做的貧窮研究，發現在生命週期的不同階段，發生貧窮的可能性並不相同，尤其在兒童、父母、老年等三階段，特別容易落入貧窮。在兒童階段(5~15 歲)，生活仰賴家庭養育，若家庭經濟資源降低，則兒童落入貧窮的機率也將大增。在父母階段(30~40 歲)，此階段貧窮率的上升是因為家中老人與小孩依賴人口增加，因需要照顧依賴人口而降低家庭所得來源所致。在進入老年階段(65 歲以上)，此階段因老人淡出勞動力市場，經濟來源頓失，極易落入貧窮。老人貧窮在這三個階段中最為嚴重，一旦老年人口淡出勞力市場，其經濟來源必然受限，若家庭無能力在此時照顧老人，或者政府若無適當的移轉收入來幫助老人生活，則老人落入貧窮的機會將會大增(何華欽、王德睦與呂朝賢，2003)。

老人是貧窮研究關切的議題，林松齡(1980)研究臺灣中部地區的貧窮現象，研究發現戶長年齡會直接影響低收入戶的經濟收入，年齡越大的老人，健康狀況不佳、工作能力喪失、經濟收入越差。林萬億(1994)指出即使在嚴苛的貧窮界定下，

社會救助的對象幾乎是社會中的最底層的無依老人。他們形成低收入戶的原因，其中以年邁體衰為主要成因(林萬億、李淑容與王永慈，1995)。張清富(1993)認為老年人口占低收入戶人口比率逐年升高，這和人口老化以及一代型的家庭所占比率持續增加的現象有關。然而在低收入戶的老年人口中，有一部分是單身者，他們一方面沒有親人照顧其生活起居，亦無法享受家庭的溫暖，如何解決這些人的生活困境是社會救助的一大重點。可見年邁體衰是老人貧窮的重要成因，而老人貧窮的家戶類型中，老人獨居問題亦需要重視。

在貧窮動態的研究發現，老殘是落入貧窮的主因，陳正峰、王德睦、王仕圖與蔡勇美(1999)嘉義縣的低收入戶的貧窮動態研究，以 1988 年至 1996 年嘉義縣低收入戶複查表資料作分析，研究致貧因素、貧窮的持續時間及其影響因素、脫離貧窮方式與影響因素，研究發現落入貧窮的主要原因為年老無法工作(老人單人戶)、戶長久病或殘障、失去家計負擔者(女性單親戶長家戶)，而且老年家戶貧窮持續時間長。最近的貧窮家戶類型研究，發現小戶量家戶貧窮率比大戶量家戶還要高，在小戶量家戶中，尤以老人家戶最容易落入貧窮。何華欽、王德睦與呂朝賢(2003)以預算標準法來訂定與模擬貧窮線，研究發現老年女性家戶長離婚或寡居者、老年戶長小戶量(單人或雙人)家戶者，在各項貧窮定義下較易落入貧窮。王德睦、呂朝賢與何華欽(2003)更進一步以 Citro and Michael(1995)所建議的方法，以食物、

衣服、居住、基本設施為基礎，以此與其他消費的比例，設算標準家戶（四口之家）的貧窮門檻，並考慮家戶人口量、成人與兒童的生活成本差異，調整家戶貧窮門檻來劃定貧窮線，並且調整合宜的均等比後，發現老年人口與小戶量家戶（尤其是單人家戶）的貧窮率較高。在小戶量家戶中，小戶量家戶戶長年齡組成以 50 歲以上的中老年人居多，且單人家戶與雙人家戶的貧戶率又以 65 歲以上老人家戶居高。小戶量家戶中，中老年家戶貧戶率偏高的可能原因是中老年時尋找合適的工作不易，在漸漸退出職場與失去謀生能力的情況下，貧戶率急速上升。而小戶量家戶中的貧窮老人家戶，以男性老人單人戶、女性喪偶老人單人戶居多，而且這類型老人單人戶的共同特性就是沒有工作、謀生不易，可見高齡老人單人戶是社會中最不利的一群，亟需社會福利政策的關注。

參、降低老人貧窮的福利措施

若我們將福利視為一種個人經驗，個人須對於自己的行動負最大的責任，那麼我們可以將窮人分為值得救助與不值得救助兩類。而老人缺乏工作能力，屬與值得救助的類別，政府有責任幫助他們度過困境（Barry, 1999；Piven & Cloward, 1993）。政府幫助貧窮老人度過困境的方式，可以透過社會救助或現金移轉，來改善貧窮老人的生活，而且這是一種社會責任。

Spicker（1993）指出，老年人口的高貧窮率主要是因為退出勞力市場，缺少薪資所得，及未有適當的移轉所得所造成。

不過自社會安全網擴大、福利移轉給付擴大後，老年人口的貧窮率已經開始下降。Spicker 研究法國、德國、瑞典、英國與美國的社會安全給付對於不同類別貧戶的減輕效果，發現不論那個國家社會安全移轉對於獨居老人與老人夫妻貧戶的減輕效果皆最大，其中最高的是瑞典，移轉前（pre-transfer）的貧戶全因社會安全給付而脫離貧窮，最低的則是美國。換言之，歐美國家自實施社會安全制度後，由於老年人普遍領有年金與其他社會安全給付，使致移轉後（post-transfer）老年人的貧窮率反而低於其他群體與平均的貧窮率。由 Spicker 的研究得知社會安全制度的推行，透過所得移轉可以有效的降低老人的貧窮率。

在上述歐美研究中，可知福利制度的推行，透過所得移轉有助於減輕貧窮程度。而臺灣為因應人口老化與貧窮對經濟安全的衝擊，政府對老人家戶提供一系列的經濟補助安全措施，對弱勢的老人，提供生活扶助之經濟協助，也針對符合資格條件的 65 歲以上老人，發放敬老福利生活津貼，以期能改善老人的經濟生活（孫健忠，2002）。除了經濟安全補助外，尚有社會救助的四大業務（生活扶助、醫療補助、災害救助與急難救助），來建構社會安全體系與社會安全網。生活扶助乃提供每一個國民最低維生標準的現金給付，醫療補助則是補充全民健康保險之不足，使低收入戶家庭成員確保健康照顧水準，災害救助為避免國民因天災而陷入貧困，而急難救助則免除國民因緊急事故導致家庭陷入貧

困。在四大業務中，生活扶助、醫療補助這兩大業務乃以社會救助法所規定之低收入戶為主要救助對象。在人口老化日趨嚴重的臺灣社會，政府為因應國內人口老化對經濟安全的衝擊，政府持續對老人等經濟弱勢者，提供生活津貼等經濟協助，這種以生活扶助的現金給付與老人津貼來幫助弱勢老人的策略是否有奏效呢？老人的經濟生活是否可以達到改善？或者我們該如何評估福利政策執行的效果，成為新的研究課題。

四、社會資訊管理與政策效果評估

從邊沁的效益（utility）觀點來思考，一個福利制度推行之成敗，端視其後果而決定。當福利政策對某類弱勢人口群進行救助、所得移轉等，當投入大筆經費後，如何評估成效成為研究評估的課題。若吾人探究社會福利的政策效果，以目前各級政府統計的資料來看，僅有概略粗分類的資訊可供應用，但若吾人想知道某類弱勢

人口群（老人的貧窮）是否改善，則並沒有特定群體（老人群體）改善的資訊可茲利用。例如以政府移轉收支的效果來看，民國 92 年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註 2）顯示，各級政府發放之低收入戶生活補助、中低收入戶老人生活津貼、老農福利津貼、殘障生活補助、災害急難救助，以及各項社會保險（包括全民健保、公保、勞保、農保等）保費支出補助，確實有效的降低所得差距、減輕低所得者的生活負擔，計縮減所得差距倍數 1.12 倍，顯示政府持續推動社會福利措施，有助低收入家庭所得提升，減緩所得差距擴大趨勢。而家庭對政府移轉支出（稅捐、規費及罰款）亦縮小所得差距 0.13 倍，總計家庭與政府間之移轉收支縮減所得差距約 1.25 倍（詳見表一）。此分析結果說明政府移轉所得能縮小整體家戶所得不均的差距、改善低所得家戶的生活，但是此類資訊是整體資訊，並無法從資訊中獲得政府移轉所得對弱勢老人經濟改善的效果。

表一 政府移轉收支對家庭所得分配之影響

單位：倍

年別	對（從）家庭移轉 收支前差距倍數 (1)	移轉收支效果			實際（目前） 差距倍數 (1)+(2)
		對家庭移轉支出 （社福支出等）	從家庭移轉收入 （直接稅規費等）	合 計 (2)	
89 年	6.57	-0.88	-0.14	-1.02	5.55
90 年	7.67	-1.13	-0.15	-1.28	6.39
91 年	7.47	-1.18	-0.13	-1.31	6.16
92 年	7.32	-1.12	-0.13	-1.25	6.07

註：表格資料擷取自民國 92 年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以社會救助的例子來看，由民國 90 年臺閩地區低收入戶生活狀況調查顯示，低收入戶接受政府救助之主要來源，前三項依序為生活扶助（重要度 60.26%）、身心障礙者生活補助費（重要度 32.97%）、老人生活津貼（重要度 24.97%）；第一、二款低收入戶依賴政府生活扶助的重要度分別更高達 91.65%、78.37%，遠高於第三款低收入戶之 45.11%。此外第一款低收入戶因老人戶居多，故其老人生活津貼重要度 51.84%，除僅次於生活扶助，亦較其他救助項目來的重要。這份調查報告顯示低收入戶的確有賴於政府救助，但是關於臺灣整體貧窮程度的改善、救助前、後的效果差異並未在這份報告中顯示，而且如果我們想要知道老人的貧窮是否隨著社會救助而降低，此研究資訊也不足。

再舉一個社會救助的例子，吾人思考社會救助對老人的效果問題，若以接受社會救助的低收入戶比例（註 3），通稱官訂貧窮率來看，也是無法有效看出老人貧窮程度是否降低。因為社會救助標準似乎過於嚴苛，歷年來約維持在 1% 上下、變化不大，而且因政府預算限制與低收入戶資格的行政判定都會影響到實際的貧窮率，所以我們很難從官訂貧窮率中看出實際的救助政策效果。

解決上述問題的作法，可以運用學界目前常用的貧窮線測量標準，來設定貧窮線，並分析現行老人家戶收支資料，那麼就可以依此測量出社會救助移轉前與移轉後的效果。測量移轉前與移轉後老人家戶貧窮率的變化，即可得知社會救助移轉所得對老人家戶的效果有多大。然而這需要

專責研究機構長年的資料管理與評估。

臺灣現行的研究資訊並非不足，例如：內政統計資訊服務網（註 4）內提供許多相關的資料數據、統計通報，可供研究參考使用。其中，調查摘要分析、專題分析也能適時的提供一些分析內容，作為學術引用。但是當研究者對於某項研究數據有興趣，想要進一步深入分析資料變項內容時，常遇資料庫不知從何申請、下載的窘境。學術研究資訊日新月異，學術資訊需要長期的交流運用，一個好的研究資料管理網站，也需要設置網路討論區，針對各種民生、政策問題開闢討論網，讓研究意見可以藉由研究討論網相互交流，其流通功效比定期的期刊、研討會迅速。然而克服這些問題並不困難，以中央研究院的學術調查研究資料庫（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簡稱 SRDA）為例（註 5），此調查資料庫蒐集了國內許多的大型研究資料，提供研究者調查資料檢索、申請、下載運用，除此之外在意見交流討論區也設計各資料庫討論區，可以預期未來相類似的管理機制可以更為普及。而臺灣正是需要類似的專責研究機構，長年的管理研究資訊與評估政策效果。

以美國貧窮門檻（poverty thresholds）為例，截至目前已累積了四十年的評估研究基礎。美國官定貧窮測量的門檻，源自於美國人口統計局（U.S. Census Bureau）以 Orshansky（1965）的研究作為貧窮測量的基礎，在那時主要的企圖是去量化窮人的數量與分布情形。當詹森總統向貧窮宣戰後，政府部門對於測量貧窮作戰的成果有極大的興趣，也因此 Orshansky 的貧窮

測量被政策制訂者與學者廣泛運用，並進而在 1969 年，美國預算局（Bureau of Budget，現在為 OMB：Office of Management & Budget）採取 Orshansky 的測量方式，作為美國官訂貧窮的標準（Weinberg, 1995）。

現行美國貧窮率有兩種參考依據，一是貧窮門檻、另一是貧窮指標（poverty guidelines）。貧窮門檻是由人口統計局為了『統計』的目的而制訂，此統計數據又稱為官訂貧窮率（official poverty rate），除了每年定期測量總體貧窮率與窮人人口數量外，人口統計局也針對弱勢的人口群測量其貧窮率的變化，以作為政策評估的依據；而貧窮指標則是由健康與人群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 Human Services，簡稱 HHS）為了「救助管理」的行政目的制訂，主要是用來決定聯邦福利體系最少需要花費多少財政經費，所以可稱得上是政府財政管理預估的工具。

上文所談的政策效果評估，需要建立一個如同美國人口統計局的專責機構來評估管理，才有辦法長年累積評估研究的成效。專責機構的成立目的，不僅止於政策效果評估，還可以作為研究資訊的管理中心，定期發布評估資訊、研究資訊、資料庫連結、研究資訊勘誤等。

研究資訊勘誤，對於研究者而言相當重要，各方研究資訊的發布，若無交叉比對則易產生混淆。以老人單人戶為例，根據 1990 年與 2000 年兩次「戶口與住宅普查」（註 6）中家庭型態的改變，其中最明顯的改變是「核心家戶」比例減少，而「單人家戶」比重上升，單人家戶的比重在十

年間由 13.4% 上升為 21.5%。若我們從家庭收支調查資料來計算，單人戶占總住戶的百分比從 1991 年 5.83% 持續增加至 2000 年 10.82% 的高峰（薛承泰，2002）。「戶口與住宅普查」與家庭收支調查資料中，老人單人戶均呈現上升的比例，然而百分比的估算則有差距，不同的資料來源會產生估算上的差距，但造成差距的原因探究（例如家庭收支調查資料的抽樣誤差），則需要研究專責機構來公開釋疑。

研究資料下載的便利，也可以促進研究資訊交流與政策效果評估。以盧森堡所得研究（Luxembourg Income Study，簡稱 LIS）為例，此機構不僅發布跨國研究資訊，還連結世界各國收支調查資料庫以供研究者下載評估使用（註 7），堪稱跨國研究資訊交流中心，而美國的貧窮研究機構（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overty，簡稱 IRP）與世界銀行等網站也有類似資訊整合功能。

跨國比較研究是與全球接軌的途徑，臺灣目前已經開始有專責的資料庫管理機構、開始有相關資料庫研究討論的網路機制，然而還缺乏相關跨國資料庫的連結與討論。以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調查資料為例，是一個便於與世界接軌的資料庫，臺灣未來或許可以學習盧森堡所得研究，先初步蒐集亞洲各國的家庭收支調查資料，做亞洲的家庭收支跨國研究，如此對於臺灣社會科學的發展、研究資訊傳播能有助益。

總而言之，政策的評估與研究資訊的管理需要整合性的研究中心統整處理，若無此類中心的形成，則研究彙整與累積不

易，行政部門也無法立即清楚獲知政策效果到底有多大。未來是否能有測量的專責機構與建立政策評估的機制則有待多方努力。

四、政策評估的多元指標運用

社會救助或津貼的政策評估，常以貧窮率的變化來判定政策效果。然而貧窮率指標在實際的政策評估運用上，可能會產生不足的訊息，進而影響政策效果的評估。

以社會救助為例，如果政策的目的是要讓社會中最窮的老人得以福祉提升，那麼救助的效果光看貧窮率變化則可能會不明顯，因為社會救助能讓最窮的老人改善生活、提升福祉，但已提升福祉的老人若所得尚未脫離貧窮線下，則貧窮率仍無法反映此項政策改善之效應。再者，若老人貧窮率的降低，是由於政策措施讓許多所得低於貧窮線但距離貧窮線較近的老人脫貧所致，則此種政策效果顯著，但也違反社會福利分配的基本精神——讓最貧者得到最好的幫助。因此在實際政策的評估運用上，單靠貧窮率指標是不足的，因此常需以貧窮強度指標來輔助，讓政策評估者得知平均而言窮人到底有多窮、距離貧窮線到底有多遠。

但即使用貧窮強度指標來評估政策的成功與否，依然有不足之處。基於此，Sen（1976）的多元貧窮指標研究則試圖呈現貧窮複雜的社會面貌，其意義在於貧窮率是否降低不再是政策評估成敗的判準。救助政策的施行雖可能沒有減低老人的貧窮率，但是卻是可以減輕某些老人的貧窮程度，而這些減輕的程度可以在多元貧窮指

標中得以討論，所以這對於救助政策評估、或是政府應不應該支持某些政策，多元的貧窮指標成為一個很重要的修正。

當研究者想要對社會救助的成效做評估時，這種多元的貧窮指標可以明確的測出，政策的效果到底是雨露均霑的改善所有貧民的生活困境，還是僅只偏重於某一類的貧民。由此可知，為更適切的了解政策的內涵與評估其成效，我們得用一多元的貧窮指標為我們提供適當的研究相關資訊，以利政策的設計與評量。因此如何適切應用多元指標以利政策評估，成為未來政策評估需考慮的問題。

四、結 論

國內老人研究累積相當具有貢獻的文獻，然而欲討論政策對老人的效果時，常遇缺乏評估資訊的問題，無法立即獲得政策效果有多大。一項社會政策的施行，必須有評估才可得知效果，然而效果的評估面向很多，該由何種方式進行才不致於耗費成本，也是需要考量的重要課題，以社會救助為例，當政府投注大量經費改善老人家戶時，我們該如何獲得救助效果的資訊呢？簡易的方式，可以利用貧窮率的變化，抑或多元指標的變化來判別救助效果的大小。我們可以思考老人家戶接受政府救助前、後的貧窮率差異、多元指標的變化，來作為救助效果的衡量、評估執行成效。

在評估過程中，研究者可以將政府移轉給老人家戶的金額，作為老人家庭資源的計算依據，當老人家庭資源不包括從政府移轉時，那麼老人家戶的貧戶率為何？

反之，當老人家庭資源包含從政府所得移轉時，那麼老人家戶的貧戶率又有何變化？以這兩種貧戶率的變化，我們可以區分出有無接受政府移轉的政策效果。而且也可以由這些貧戶率的變化中，計算出政策的效果多大。如此對於研究者與政策制訂者而言，才能立即的、有效的掌握政策執行的效果，對於未來政策的制訂與建議才能有確切的依據。

關於政策評估的工作，本文建議成立研究資訊的專責機構，定期評估、發布研

究資訊，並考量多元指標做為政策評估的測量工具，如此一方面可以提供研究者研究資訊的獲得，另一方面可以讓政策制訂者快速瞭解政策成效。

（本文為國科會委託之「社會救助對老人單人戶與貧窮率的影響」（NSC93-2413-H-020-004-）研究計畫報告一部分改寫而成，謹此致謝。）

（本文作者現任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助理教授）

註釋

註1：詳見經建會，2004年9月29日，網頁：<http://www.cepd.gov.tw/indexset/indexcontent.jsp?task=direct&topno=3&url=../upload/news/2004/930929.doc>

註2：詳見主計處中部辦公室民國92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網頁：<http://www129.tpg.gov.tw/mbas/doc4/92/book/Analysis.doc>，2004年11月24日查詢。

註3：官訂貧窮率是一種通稱，嚴格來說，臺灣如美國一樣並未有官訂貧窮率，一般採用的官訂貧窮率是低收入戶（人數）比例，主要是作為社會救助之用途。

註4：參閱網站：<http://www.moi.gov.tw/stat/index.asp>

註5：參閱網站：<http://srda.sinica.edu.tw/index.aspx>

註6：資料來源：<http://www.dgbas.gov.tw/census~n/six/lue5/cen8904.rtf>

註7：參閱網站：<http://www.lisproject.org/techdoc.htm>

參考文獻

王德睦、呂朝賢、何華欽（2003）臺灣貧窮門檻與測量的建立：FCSU的應用，臺大社工學刊8：1—46。

何華欽、王德睦、呂朝賢（2003）貧窮測量對貧窮人口組成之影響：預算標準之訂定與模擬，人口學刊27：67—104。

何華欽、王德睦、呂朝賢（2005）臺灣的貧窮測量：發生率、強度與不均度，人口學刊，30：1—28。

林松齡（1980）臺灣中部地區貧窮現象之研究，臺灣銀行季刊31（3）：189—223。

林萬億（1994）福利國家——歷史比較的分析，臺北：巨流。

- 林萬億、李淑容、王永慈（1995）我國社會救助政策之研究，內政部研究報告。
- 張清富（1993）臺灣省貧窮趨勢與致貧因素之研究，臺北：豪峰。
- 陳正峰、王德睦、王仕圖與蔡勇美（1999）老人單身家戶、女性單親家戶與貧窮：嘉義縣低收入戶的貧窮歷程，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1（4）：529—561。
- 孫健忠（2002）臺灣社會救助制度實施與建構之研究，臺北：時英。
- 薛承泰（2002）1990年代臺灣地區單人戶的特性：兼論老人單人戶之貧窮，人口學刊 25：57—89。
- Barry, Norman (1999) Welfare, USA: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itro, Constance F., and Robert T. Michael (eds.) (1995) Measuring Poverty: A New Approach,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 Orshansky, Mollie (1965) Counting the Poor: Another look at the Poverty Profile,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28(7):3-29.
- Piven, Frances Fox and Richard A. Cloward (1993) Regulating the Poor: the Functions of Public Welfar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Rowntree, B S (1901) Poverty: A Study of Town Life, London, Macmillan.
- Sen, Amartya (1976) Poverty: An Ordinal Approach to Measurement, Econometrica, 44(2): 219-231.
- Spicker, Paul (1993) Poverty and Social Security: Concepts and Principles, New York: Routledge.
- Weinberg, Daniel H. (1995) Measuring Poverty: Issues and Approaches, Census Bureau working paper.